

青年為何投奔「聖戰」？

忽然文化

撰文：占飛

jimfly@hkej.com

幾乎每隔幾天就有報道稱，西方年輕人偷偷投奔「伊斯蘭國」（最近，南韓、印度亦有個別青年響應）——他們為什麼會離家出走、鋌而走險呢？

■伊斯蘭國軍人在利比亞進行閱兵，但即使稱「國」及「國兵」，其政治地位也不被國際承認，更因手段凶殘，被定性為恐怖組織。



投奔「聖戰」，最主要是由於缺乏身份認同，長期以來，穆斯林族群青年在德國、法國、英國、比利時、荷蘭等地被邊緣化，新一代對所在地根本並無歸屬感，雖生長於斯，但感到受壓迫和受歧視，心存怨恨，因此漸漸萌生極端想法，易受極端組織的宣傳「洗腦」。

站在最前線

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曾指出，根據美方統計，目前已有一萬二千餘名外國武裝分子潛入伊拉克、敘利亞等地參與恐怖活動。從媒體的報道看來，當中固然以歐洲青年為主，亦不乏北美（美國及加拿大）青年；投奔「伊斯蘭國」的美加青年也許數量並不多，因為前往敘利亞或伊拉克的路途相對複雜而轉折，相對而言，「伊斯蘭國」大本營卻是歐洲的鄰居，而跳板是土耳其。

據《今日美國報》估計，「伊斯蘭國」所招募的英國穆斯林，可能比之為英軍作戰的還要多。據英國國防部資料，英國武裝部隊有二十萬人，當中約有六百名穆斯林軍人，但據官方估計，參與敘利亞和伊拉克軍事活動的英籍「伊斯蘭國」戰士，則多達八百人。

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研究人員指出，英國青少年在身份

認同上存在困難。在深受危機和失業打擊的城郊地區，年輕一輩普遍感到壓抑、被排擠、受歧視，故此他們要到一個不會被邊緣化的地方去——那就是他們毅然加入極端組織的原因，他們不欲充當小角色，而是要站在最前線。

加入極端組織的歐洲青年大多是穆斯林移民，以比利時為例，年輕移民缺乏身份認同，對比利時毫無歸屬感，國家根本就不存在，到處都是說弗萊芒語、說瓦隆語和說德語的人，比利時很多改革都無法持續，國家有如四分五裂，相對而言，極端組織的一元化權力結構無疑更具魅力。

歐洲的阿拉伯裔青年大多為第二代移民，他們根本不懂阿拉伯語，但由於在所處身的社會始終是弱勢族群，故此特別同情中東人民的苦難。他們認為中東地區所有麻煩都是西方國家造成的，對西方充滿怨恨，激進想法長期存在，更極易受媒體危言聳聽所影響，因此很容易被異端的軍事化革命所同化。

如何令穆斯林移民後裔融入當地社會，一直是讓英、法、德、比、荷等歐洲國家至為傷腦筋的問題；「伊斯蘭國」成員嚴格執行伊斯蘭法，一舉一動必須遵從伊斯蘭教規，而西方青年對伊斯蘭教一知半解，這一點亦是一大

誘因。

許多歐洲年輕人，尤其是一些不合群的、年齡介乎十五二十時的迷失一族，更易受到為「理想」而戰的觀念所迷惑，以為加入「伊斯蘭國」等極端組織就能獲得汽車和槍械，可改變人生，而他們的人生大都叛逆而頹廢，跟社會、家庭和家人的關係極不融洽，投奔中東而服從於權威管治，倒有明確的人生目標。

殉教或新生

「伊斯蘭國」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宣傳手段，他們利用推特、面書和一些中東本地社交網站，每天發放約九萬條信息，誘使在西方國家長大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青年人加入；「伊斯蘭國」宣傳策略似乎更能吸引年輕一代投身「聖戰」：有些期望可「殉教」升天；一些青年覺得那是冒險的大好機會，逃離原有社會及家庭的束縛，從而開展新生。

由此可見，要終止青年大批投奔中東的大趨勢，則務必從根本做起，那是說，歐美各國得要消解「伊斯蘭國」的宣傳攻勢，那就無疑必須糾正移民及社會政策的種種謬誤，全面檢討以往的中東政策——殖民時期已悔不可追，後殖民時期則不可再聽之任之了。

■曾殺害多名外國人質的恐怖分子「聖戰約翰」，近日有報道指他是科威特出生、入籍英國的青年埃姆瓦齊。



精神分裂症

德國自由派伊斯蘭聯盟主席蘭雅·卡多爾（Lamy Kaddor）乃敘利亞後裔，在德國出生，著有《準備殺人》（Ready to Kill），她接受德國媒體訪談時指出，西方青年之所以投奔「伊斯蘭國」，主要是並無得到當地社會所承認，到了尋找自我認同的年齡，就讓不斷吸納新人的極端組織有可乘之機。

卡多爾認為那是一種精神分裂症：他們迷失在「德國」和「穆斯林」之間，從而體現出分裂性；他們起初宗教意識並不濃厚，為何慢慢地走向極端？那就是由於所謂「虔誠」，他們的世界觀，從此只有敵友之分。她指出互聯網起着重要作用，青少年正是在互聯網上接觸極端思潮，遂萌生了對全能化身的迷思：他們突然覺得自己

就是法律，可扭轉在伊拉克或者敘利亞的不公義。

「聖戰的浪漫性」尤其容易吸引年輕女性，她們會被告知：她們會成為值得尊敬的妻子，和戰士結婚，丈夫將會成為偉大的英雄，因為他們終有一天會成為殉道者。

抗議社會

卡多爾指出，不管是政治上的薩拉菲（Salafi，又譯塞來非、塞來非）思潮，還是提倡聖戰的極端薩拉菲組織，都對青少年特別有吸引力；面對不公義的德國社會，還有什麼能更能表達他們的抗議呢？

此所以原先只是反叛的抗議運動，年輕人每每透

過音樂、服裝、鬍鬚、髮型團結起來，但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，是穆斯林或其他宗教的信徒，每一個青少年都有可能受到薩拉菲教派的「洗腦」——此一教派不光光透過宗教信仰來招納新人，更透過行為特徵來識別青少年的社會心理狀態。

她認為，此一意識形態是針對青少年，亦是薩拉菲特別危險之處——此一教派跟極右翼思潮一樣，具有傳染性質，年輕人在被極端宗教思潮同化的過程中，總是會跟家庭、同學、朋友圈保持距離，在被極端化之後，他們會突然宣布：世界上只有兩種人：信教的和不信教的，穆斯林是受害者，其他人都是施害者，所以「革命」是必須的。

■卡多爾著有《準備殺人》一書，她指出西方青年之所以投奔「伊斯蘭國」，主要是得不到當地社會的認同。（圖片提供：Anne List）



卡夫卡 kafka@hkej.com

生活化平凡藝術 日夜雙生最真實



■Job Koelewijn, *Relief 2:2 5 March 2009-6 Jan 2012* (2009-2012)



■Jewyo Rhii, *Monument of Typewriter with Undercover Words* (2010-2011)

存在主義認為「存在先於本質」，人先存在，再而尋找存在的意義。人生是荒謬而孤獨的，然而存在主義者相信人有獨立的選擇自由，也因此，存在的最大意義是忠於最真實的自己，活出最真實的生活。

然而有多少人認真思考過自己的生活及其價值？每天重複着同樣的生活節奏，又有多少人覺得自己曾真正活過？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在展覽「日夜雙生」（展期至4月26日，Spring Workshop）裏，齊齊探討這個與生活有關的問題。

緩慢深沉

一進門，迎接觀眾的是南韓女藝術家 Jewyo Rhii 的作品，其風格也帶有獨特的女性感受。她以三件作品重塑在首爾工作室的時光，當時是炎熱潮濕的夏天，她一人打着字寫作，逐漸進入孤獨而寧靜的心靈境界。

這種感受她透過三個作品呈現，一個是用廢棄物料重塑成打字機的裝置，上面的字粒是神秘不可閱讀的文字，在打字機後方，則有更多無法閱讀的字粒藏在盤子裏，如走進了當時藝術家迂迴的思路裏。

旁邊則是兩個與冰有關的裝置，一個用兩把風扇把冰的冷氣吹到觀眾前，另一個則是鐵盤上不斷溶解的龐大冰塊，全都讓人聯想起夏天汗水黏膩的時光。

如今許多人都只閱讀網上的文章，甚少觸碰實體的書籍，所讀的都是容易吸收理解的文章或消閒故事，少看深邃的文史哲專書，因此書局中相關的書籍總是滯銷，不少人都形容出版業是夕陽工業。

來自荷蘭的 Job Koelewijn 把兩種已經走

入歷史和即將走入歷史的媒介——卡式錄音帶與紙本文史哲書相結合，要自己每天在早晨抽出四十五分鐘的時間閱讀文史哲書籍，最後把近三年的閱讀成果堆疊成裝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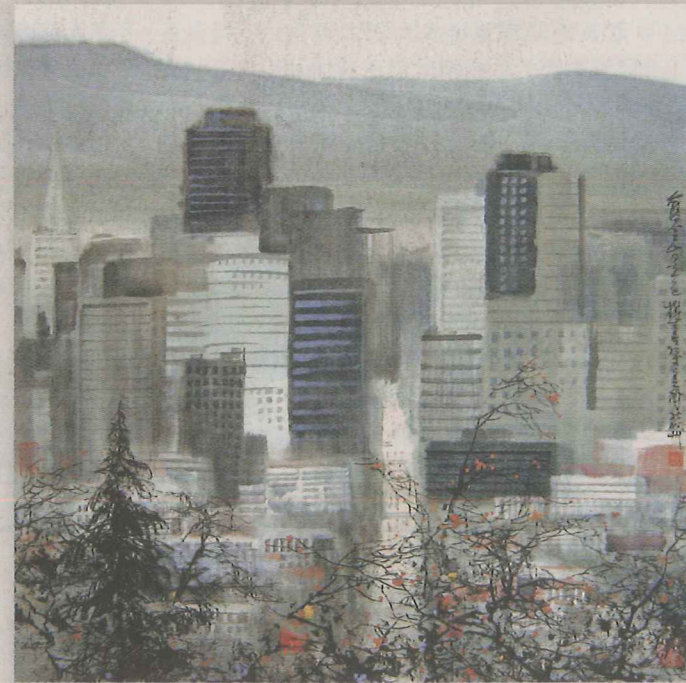
Moyra Davey 的作品 *Subway Writers* 與這個作品也產生對應，地鐵中人人都各自看手機，拿書閱讀的人已經不多，更遑論是拿紙筆寫作。藝術家卻在紐約地鐵中尋找各種寫作的足跡，將他們的動態拍下，摺疊成四方形，在上面貼上地址，用原始的郵寄方式寄給世界各地的朋友，再重新蒐集排列成藝術品。這兩個作品都提醒人：「老派」的緩慢而深沉的生活，正正是我們所缺乏的。

虛幻空間

展場中兩個相鄰的空間構成有趣對比。一個是北歐藝術組合 Elmgreen & Dragset 所塑造的 *Hong Kong Diaries* 表演和裝置，他們塑造了一個冷色調、無人情味，有如工廠或辦公室的生產空間，邀請六位年輕的香港男性在其中撰寫日記，記下自己對於現在和過去的反思，把私密的行動化成無情感的生產，以及人人都可審視的表演，而當下城市密集的生活不正如此嗎？

至於香港藝術家李傑，他以自己台北居所的環境照片投射於牆壁上，在走廊重塑一個私密空間，這個私密空間卻又是人人可穿越，並且阻礙投影的。在投影的中央有 flower 一字，旁邊貼着一張紙，上面有一隻手繪的手，來自布列松電影，手與花之間構成虛實之間互相重疊又不可觸碰的距離，一如觀眾之於這個虛幻空間。兩個作品雖然焦點不一，但都是提出人與自身隔絕的想法。

藝術長廊 margaretchan@hkej.com



劉懋善《舊金山景色》

56cm X 56cm

劉懋善的作品風格獨特，色調明麗，充滿詩情畫意，尤以江南水鄉系列作品，膾炙人口。近十年來，他先後訪問了日本、英國、美國、意大利和俄羅斯等地，並進行學術交流，創作了一系列異國風情畫。